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以来,中日之间在经济贸易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步。今年上半年我国对日本的出口额约为4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8.6%;从日本的进口额为41亿美元,比去年增加了3.4%,实现了两国间贸易的整体平衡,改变了诸如1982年因我国项目建设调整出现18亿美元顺差、以及1985年因过量进口出现60多亿美元逆差的不正常状况。中日之间由贸易而发展到投资始于1979年,1984年初具规模,对中直接投资总额为1.1亿美元(66个项目);1985年为1亿美元(118个项目);1986年为2.3亿(85个项目);1987年为12.3亿(101个项目),呈现逐年增长的局面。但是,与日本对东南亚各国的投资相比,这一增长率则是缓慢的。此外,贸易上的不平衡虽然得以克服,在投资上依然存在着极为明显的不足之处。中日贸易额占我国外贸总额的20%以上,但是,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仅占我国直接利用外资总额的5%。与港澳及美国相比,日本的对中投资处于不相称的地位。给人们的印象是:日本有兴趣做眼前的买卖,对长期经济合作持消极态度。至于日本所谓“对华投资时机尚未成熟”这一流行说法,值得予以认真研究,找出日商来中国办企业为何踌躇不前的问题症结所在,推动中日投资事业,促进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扭转日本来华投资徘徊不前局面的关键之一在于改善投资环境。如何来衡量这一点,一个重要的尺度就是对我投资环境有没

有超过亚洲新兴工业经济群体(NIEs)作出全面评估。

亚洲新兴工业经济群体,简称为NIEs(是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cs的缩写

形式),旧称为NICs,即日本人所说的“新兴工业国、地域群”,亦即南朝鲜、台湾省、香港和新加坡的代称,人们又称之为亚洲四小龙。值得一提的还有ASEAN,即东南亚国家联盟,这里指的是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先看一下日本企业在1951~1987年间对NIEs的直接投资累计数:南朝鲜1,559项,27.65亿美元;台湾省1,889项,14.19亿美元;香港2,829项,45.76亿美元;新加坡2,042项,30.65美元。日本对NIEs的投资占其在亚洲全部投资的42.4%。对NIEs投资的另一特点是在七十年代进入了大发展期,以香港最为突出,后十七年的投资总额是前二十年的198倍。

以投资增长速度作比较,中国显得落后;以每个项目的投资规模作比较,则属上乘:中国136万美元,南朝鲜130万美元,新加坡128万美元,香港122万美元,台湾省52万美元;再从投资的产业分布情况来看,对华投资中两类企业即技术先进型和产品出口型企业要比NIEs少得多,目前仍然偏重于非工业项目。存在差距的原因何在,不妨先从1987年9月日本兴业银行对其主要客户中的2,839家公司的设备投资调查结果谈起:第一,被征询的日本企业认为最重要的外资投向区域是北美和亚洲;第二,大企业的倾向意见是以北美为重点,有实力的中小企业则

日本在亚洲国家地区投资现状的比较

张
有
黑

对亚洲更为重视；第三，对于海外投资事业的产业分布说来，普遍偏重于制造业，特别是装配加工工业。再选取调查统计的一组数据来窥其全豹：被调查的 2,839 家企业中有 773 家作了意见反馈，其中就整个产业而言，加拿大和美国占 51.6%，南朝鲜 9.3%，台湾省 8.3%，中国 9.7%，其他亚洲国家共占 11.1%。众所周知，NIEs 的经济发展与对日经济关系存在着深刻的依从性；日本对 NIEs 的投资比对华投早了三十年，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综观 NIEs 经济发展的道路，始终贯穿了所谓的外向型成长政策 (Outward Looking Policy)，以导入外国资本和培育出口主导型工业为杠杆，促使其经济发展是 NIEs 工业化政策的核心。为了适应国际经济环境，南朝鲜在 1960 年颁布了外资导入促进法；台湾省在 1954 年发布了外国人投资条例，在 1960 年又有投资奖励条例出台，并在 1980 年开辟新竹科学园特区；NIEs 在外资政策的配套这一点上下了不小的工夫。观察日本八十年代以来海外投资所经历的过程可知：起初，较之台湾省更突出的是南朝鲜因贸易收支的长期赤字与日本经济产生了摩擦，日本在进口问题上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政策触犯了 NIEs，而在投资过程中过分谋取经济利益则被南朝鲜斥之为“占领市场”和“工资剥削”。日本以回避贸易间摩擦为由，将投资目标从亚洲转移到欧美等先进国家。到了 1985 年秋天，不料日元急剧升值，为了维持国际竞争能力，日本赶忙改善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大规模地在发展中国家生产零部件，迅速转移其生产制造据点。以 1985 年 9 月的 PLAZAR AGREEMENT (G5)* 为契机，NIEs 和 ASEAN 在利用日本资本上获得了一次极为有利的机遇。日本

对产业结构进行了大调整，将电气、电子机器为中心的生产线转移到海外生产，从原材料、零部件到资本筹措都设法在 NIEs 得到解决。以日元升值为起因促成的日本资本转移，呈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1986 年 9 月至 1987 年初的热点是南朝鲜和台湾省，1987 年以来相继出现的新热点是东盟的泰国和印尼。

那末，日本企业对亚洲新兴工业经济群体大举投资的背景是什么呢？如前所述，日本与 NIEs 的经济关系有着密切不可分割的一面：五十年代主要是通过贸易和政府援助形式进行，六十年代以来演化为直接投资和技术出口，日本企业是在产业、企业、日本经济、被投资国家环境等多种条件趋向成熟之后才作出海外投资这一决断的。试对日本的投资动机作一剖析，不难看出：在七十年代是以开拓和确保现地市场为重点，进入八十年代后才是利用廉价劳动力将在现地市场生产的产品扩大销售到第三国市场，换言之，亚洲地域已经不仅是市场，而且是生产基地了。日本企业充分地利用了 NIEs 的长处，诸如享受关税普惠制待遇和拥有配套齐全的出口加工区等，大力发展其对第三国市场的出口。从客观上讲，机会是均等的。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十周年为新的起点，以达成日中投资保护协议为契机，进一步致力于完善投资环境。一旦中国的投资环境全面超过了 NIEs，日本来华投资必定会出现崭新的局面。

“。”其时，美国、日本、英国、法国、联邦德国这五个硬通货代表国家的财政部长在纽约秘密召开了一次高层联席会议，对以日元急剧升值为背景的国际间主要货币关系调整作出紧急反应，互为妥协的结果便是达成了 **Plazar Agreement**。（以会议所在地 **PLAZA HOTEL** 作为该文件的代称。）